

新時代、新中國

New China in New Times

王智明¹

Chih-Ming WANG

在中國電影史上，軍事電影並不少見，而且往往與國家意識形態相關。從中國第一部軍事電影《南征北戰》，經2008年獲得金馬獎最佳改編劇本與最佳男主角的《集結號》，到最近以小鮮肉為主打的主旋律大片《建軍大業》，我們可以看到軍事電影如何再現新中國的血肉之軀與歷史靈魂，並且試圖在商業與政治之間打出一條好評又好賺的康莊大道。但是僅僅從軍事電影與商業操作的角度，並不足以說明《戰狼II》獲得歡迎的程度，也無法充份解釋它的時代意義，更不能清楚指陳交織其後的多重脈絡與意識形態。誠然，《戰狼》系列的成功與中國崛起的態勢緊密相關，但是其意義並不止於崛起的再現。相反地，它更大程度反映了崛起中國所面對的挑戰和困境，因而需要這樣的電影來進行意識形態的縫合。尤其在嚴格的審查制度下，中國的主旋律電影及電視劇往往擔負著意識形態的教化功能：電影與電視不僅僅是娛樂，更是國家意識形態再生產的場域，並且具有協助國家政策推動的功能。於是《戰狼》系列的成功，其意義或許不在於取得多大的票房，或是反映了影視娛樂產業的技術進步，而在於它所肩負的意識形態功能。因此，本文的工作就在於爬梳理解《戰狼II》的閱讀脈絡，以釐清其之於中國崛起的意義。

一、表意的脈絡：《太陽的後裔》與《人民的名義》

雖然《戰狼II》在角色和故事上是前一集的延續，但是在取材與選角上，呈現了三組相關卻不相同的意象：維和部隊、忠黨愛民以及坦克勇士。熟悉

1 王智明，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副研究員
電子郵件：wchimin@sinica.edu.tw

這三組意象的讀者自然會對電影中刻意的並置感到莞爾，乃至不安的違和，但是電影藉由大量的感官衝擊與老調的敘事橋段來掩蓋內部的矛盾，以編織出一部超韓趕美的動作大戲。追過韓劇《太陽的後裔》的讀者，大概可以立即感受聯合國維和部隊所暗示的人道精神與浪漫情景：相較於脫下軍裝的主角冷鋒，卓亦凡的裝束與出場時的賣弄，幾乎就是對宋仲基的諧仿和嘲諷，而援非的美籍華裔醫生瑞秋則在裝扮與演技上形成宋慧喬的翻版，類似的長髮與俏皮，同樣的認真與天真。《戰狼II》當然不願成為山寨版的韓劇，冷鋒的硬漢角色也顯然是對韓版花美男英雄的批評；更重要的是，除役軍人冷鋒作為傭兵的可能以及他隻身挽救撤僑行動的英勇，同時也是對聯合國多年維和部隊與人道救援無效的嚴正批評。相較於電影中瑞秋致電美國大使館無效，聯合國直升機的救援失敗，冷鋒那股不分你我、勇往直前的博愛與倔強，暗示著崛起中國將肩負起人道救援的神聖使命，但它未必會通過聯合國的形式。對照《太陽的後裔》裡的多邊協調，冷鋒的孤狼行動，一如我們熟悉的藍波，或許意味著一種質樸的單邊主義；唯一的差別是，藍波背後只有戰爭的創傷，而冷鋒的背後有著強大的國家支持。

《戰狼II》裡有兩個配角特別搶眼，一是扮演退伍軍人、工廠保安何建國的吳剛，另一是扮演解放軍少將、撤僑編隊指揮官張志勇的丁海峰。這兩者分別在今年火紅的反腐電視劇《人民的名義》中飾演主角：一個是市委書記李達康，一個是公安局長趙東來。這兩組角色的疊合與轉譯或許不是《戰狼2》劇組的刻意安排，但卻造成了非常有意思的意識形態效果：保安局長成為解放軍少將，在不准介入友邦內戰與進入他國交戰區的命令下，丁海峰表現了忠黨愛民、臨危不亂的態度，在不違背政策的前題下成為冷鋒的後盾；同樣地，在《人民的名義》裡為黨、為人民、為改革開放的事業打先鋒的吳剛，也在《戰狼II》當中走到了撤僑護民的最前線。尤其，吳剛和冷鋒一樣，都有過軍職，這就使得國家與人民的關係有了更為實質與貼近的表現：不只是國家作為人民的後盾，而是國家就在人民之間，領導、保護著人民，即令人民早已放棄了中國國籍，另謀出路。因此，雖然吳剛和丁海峰只是電影裡的配角，忠黨愛民的意識形態卻在他們的雙重身分得到了有效的發揮。在這個意義上，冷鋒不是孤狼，而是有後備支援的戰狼。

二、歷史的換喻：「站在坦克前的男人」

《戰狼II》裡最激情和壯烈的場面，大概就是冷鋒站在坦克前與之搏鬥那場戲了。但「站在坦克前的男人」(The Tank Man)大概也是上世紀90年代中國最為經典、最為西方記得的畫面，只是那個畫面的場景不在非洲，而在中國。我不確定中國觀眾是如何理解和經驗《戰狼II》裡的這個場景，也不確定他們腦海裡是否會浮現另一個「站在坦克前的男人」的身影，但是記得也好，忘記也罷，《戰狼II》裡的冷鋒都成功地完成了一次歷史的轉喻，將不畏強權的精神從天安門廣場上移轉到一個不知名的非洲角落，將歷史的現場變成一次華麗的演出，也將強權暴力的身體從中共轉化為來自一群西方、動機不明的僱傭兵身上。這個歷史的換喻或許是《戰狼II》裡最為重要的行動，不只直接將冷鋒的身體植入「中國人民站起來了」的歷史敘事裡，更讓「中國人民站起來了」的歷史期待，轉化為對祖國的正面支持。「站在坦克前的男人」不只是消失了，而是完全被置換了，一如改革開放後的種種弊端，也在習總書記撥亂反正的反腐大業中掃除殆盡。在民富之前，民主再次成為泡影；在小康均富、強國復興的夢想下，中國走入了消費泡沫、言論管制的新時代。在這個意義上，寡言豪強的冷鋒可以說是新時代的中國身體：他不善言說、不搞浪漫，但極度地忠心與激昂。他不是瀟灑優容的紳士間諜，也不是一心復仇的孔武勇士，而是嚴肅紀律卻不失個性的中國軍人。他可以面對坦克，不懼輾壓，因為他不是一個人，而是一個國家。

在以上的分析中，我們不難發現《戰狼II》高度英雄化的敘事後面，正是巍然崛起的中國，而這個中國面對著兩大挑戰：一是西方的惡意威脅，二是國際秩序對中國的要求。惡意威脅自不待言，因為來自西方的威脅恰恰是《戰狼》系列電影的起點：「辱我中華，雖遠必征」是《戰狼I》結尾的箴言，也是新時代中國對人民的承諾。國際秩序的想像則展現為對中國自律的要求，然而這個自律的要求正隨著國際局勢的轉變逐漸鬆動。中國在萬隆會議上提出的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」，恰恰在撤僑的行動中有所改動：一方面當僑民生命成為核心利益與國家任務時，解放軍或明或暗即可介入，即令電影裡的中國在內戰非洲中依然自制，不輕易靠邊，但是冷鋒的行動清楚表明

了中國非但不會受制於人，而且更傾向先發制人。²另一方面，實際支撐中國單邊主義行動的，不是核心利益的修辭，而是建立在中非友好歷史上的人道關懷。這也是《戰狼II》中的「中國特色」：不僅僅是因為中國強大了，可以接納非洲難民，更是因為中國是非洲的朋友，第三世界連帶的萬隆精神仍然指引著中非關係的發展。國際秩序的鬆動，在這個意義上，是以第三世界連帶為起點：中國在非洲，將不同於西方在非洲。然而，恰恰是在這點上，《戰狼II》的表現令人垢病：不論是對非洲發展現況的再現，還是對非洲人民的再現，《戰狼II》都沒有超越好萊塢的水準。

於是乎，在十九大順利召開的這個時點上回顧，《戰狼II》或許不只是恰巧出現在「新時代」的開端，它也象徵著新時代的挑戰與任務。問題是：我們能夠像冷鋒的非洲義子們那樣相信冷鋒、信賴中國嗎？這是冷鋒的命題，也是我們的質疑。

2 無獨有偶，在《戰狼II》取得巨大成功後，又一軍事動作電影《空天獵》(2017)順勢推出，也是關於中國軍隊在海外救援僑民的英雄電影。不同於《戰狼II》，《空天獵》的主角是中國飛行員，救援的地點則從非洲轉移到了中亞。然而相同的是，中國武力的強大，對恐怖主義的不輕言退讓，以及先發制人的打擊戰略。